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专 题 选 编 本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责任编辑：孔 欢
装帧设计：汪 莹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吕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ISBN 978-7-01-015566-1

I.①马… II.①马… ②恩… ③中… III.①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
IV.①A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7694 号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AKESI ENGESI LUN ZHONGGUO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 页 4

字 数 181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15566-1

定 价 39.00 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编辑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典,是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文献。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的形势,满足广大读者多层次的需求,我们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编译经验,考察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读物,吸收了理论界提出的宝贵建议,精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述,编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文库辑录的文献分为三个系列:一是著作单行本,收录经典作家撰写的独立成书的重要著作;二是专题选编本,收录经典作家集中论述有关问题的短篇著作和论著节选;三是要论摘编本,辑录经典作家对有关专题的论述,按逻辑结构进行编排。

文库编辑工作遵循面向实践、贴近群众的原则,力求在时代特色、学术质量、编排设计方面体现新的水准。

本系列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的专题选编本,以全文收

录或部分节选的方式辑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集中论述各种专题的论文、演讲、书信和笔记,以适应各个领域的读者学习理论和研究问题的需要。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还从未收录的著作中摘选与本专题有关的论述,编成《重要论述摘编》,作为对本专题所收文献的补充,以便更加全面地反映经典作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精辟阐述。

专题选编本系列所收的文献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最新版本的译文,以确保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准确性。自1995年起,由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陆续问世,迄今已出版24卷;从2004年起,我们又先后编译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专题选编本系列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采用了上述最新版本的译文,对未收入上述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我们按照最新版本的编译标准进行了审核和修订;列宁著作则采用由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二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译文。

专题选编本系列采用统一的编辑体例。每本书正文前面均刊有《编者引言》,简要地综述经典作家围绕相关专题提出的理论观点及其重要意义,同时逐篇介绍本书所收著作的主要内容,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把握要义;此外还概括地介绍相关著作写作和流传情况以及中文译本的编译出版情况,供读者参考。正文后面均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以便于读者查考和检索。

专题选编本系列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列宁全集》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的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加的;未

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注；人名索引的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文里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在列宁著作中，凡注明“俄文版编者注”的脚注都是指《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编者加的注，人名索引中的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印的是相关人物的真实姓名，未加黑体的则是笔名、别名、曾用名或绰号。此外，列宁著作标题下括号内的日期是编者加的；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2014年6月

编者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汇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论述。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专题文章汇编,第二部分是重要论述辑录。

一

中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长期关注的国家。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他们对中国社会情况的整体把握和深入思考,生动地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中。在论述人类历史由相互隔绝的民族和地域的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时,在考察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动因与后果时,在阐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

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将中国作为典型例证,指出中国的历史性变化对中华民族和整个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

确实,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国又勾结法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分析中国问题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他们正是围绕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进程、直接后果以及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广泛影响,对涉及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条件、民族特征和国际环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们毕生都在关注中国,在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内的理论著作和许多时评、笔记和书信中,他们一再提到中国,一方面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近代中国陷于停滞、走向衰落以致惨遭西方列强蹂躏的原因;一方面对深受压迫、奋起斗争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预言中华民族必将走向光辉的未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所作的一系列科学判断和精辟论述,对于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和本质、经验和教训,从而全面理解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中所作的历史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对中华民族寄予的殷切期望,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必将指引我们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二

本书第一部分选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53 年 5 月至 1862 年 7 月撰写的有关中国的 18 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刊载于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只有一篇文章,即马克思的《中国记事》,发表于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写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统治阶级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的反动时期。当时各种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几乎全部遭到取缔。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美国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约请马克思担任驻伦敦通讯员的机会,在该报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本书选编的就是这些时评和政论中直接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五十年代为总结 1848—1849 年革命经验而撰写的科学社会主义论著一样,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英、法、俄、美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西方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凶残酷虐的暴力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蹂躏。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科学评价中国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历史作用,热情支持中国人民为抵御列强侵

略、捍卫国家主权、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他们对中国革命寄予殷切期望,指出它必将对欧洲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满怀深情地预言: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整个亚洲将升起历史新纪元的曙光。

在《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大量的外交公函、官方文件、议会记录和法律条文,以确凿无疑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罪恶目的和策划过程,戳穿了资产阶级政客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谎言和骗局。他们指出,“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是在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见本书第 54 页);英国政府为挑起战争而制造事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欺骗公众。鉴于英中冲突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见本书第 52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厌其详地向公众介绍了各种重大事件的始末和细节,有理有据地指出:在这场冲突中,正义在中国一方,中国人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因此“中国人的雄辩”“显然无懈可击”(见本书第 24 页);而英国一方则蛮横无理,出尔反尔,用极其“虚伪和空洞”的理由“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见本书第 54、51 页)。针对英国政府对中方的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见本书第 54 页)。这些论述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道义和真理的鲜明立场。

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鸦片贸易史》、《英中条

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英国的政治》、《中国记事》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援引大量文献资料,列举各种统计数据,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见本书第 69 页)。英国的鸦片贸易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源枯竭、国库空虚,以至整个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受到严重损害,“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见本书第 54 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是天经地义的行动;而英国政府面对中国的禁烟举措,竟用“海盗式的借口”对中国采取“海盗式的敌对行动”,进而以“海盗式掠夺精神”对中国悍然发动“海盗式的战争”(见本书第 80、99、56、79 页),这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对人类尊严进行的粗暴践踏。“海盗”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屡次出现。他们认为只有用这个词来形容道貌岸然的英国政府才最准确、最贴切。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英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称作“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见本书第 58 页),将战争的发动者称作“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见本书第 64 页),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见本书第 120 页)。他们愤怒地揭露了英军在中国境内的血腥暴行:“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

而引起。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见本书第 14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英国政府之所以发动战争，就是为了强占海外市场，掠夺资源财富，满足资产阶级的贪欲，进而将中国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尤其是在英国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英国政府更是迫不及待地挑起战争，以牺牲被压迫民族的正当权益为手段，牟取经济暴利，转移国内视线，企图以此来稳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积聚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的本质特征，义正词严地为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辩护。他们认为，中英双方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是非曲直，本来是十分清楚的，“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见本书第 21 页）然而在当时，欧美公众获得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印象。人们几乎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见本书第 52 页），是“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见本书第 54 页），这才使英、法、美等国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不得不采取所谓自卫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众的错误印象主要起因于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笨拙》和《经济学家》以及法国、美国某些报刊蓄意传播的错误信息。他们对西方新闻界颠倒黑白、欺世惑众的卑劣手法表示强烈的义愤和蔑视，一针见血地指明那些道貌岸然、假装公正的西方报刊自觉充当了资产阶

级政府“最卑鄙的走卒”(见本书第 86 页),是战争罪行的“最忠实的辩护者”(见本书第 75 页),是当面撒谎而毫不羞愧的“小丑”(见本书第 4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仅限于声讨和谴责。他们高度重视新闻的作用。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他们在文中用大量的篇幅对西方媒体散布的谣言逐条予以批驳,对它们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手段逐一加以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见本书第 54 页)那么,公众通过传媒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对“背信弃义”的中国人的谴责,是对“仁至义尽”的英国政府及其鹰犬的赞颂,是“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见本书第 10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西方媒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诱导西方普通民众相信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让他们“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见本书第 54 页)。西方媒体如此卖力地为政府效劳,是受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这些报刊“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见本书第 44 页)。这个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的警句,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本质特征的最简洁、最准确的概括。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近代中国走向衰落、以至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的原因。他们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见本书第6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见本书第122页);“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见本书第111页)只能维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阻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见本书第133页)因此,这个国家根本没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抵御列强的侵犯。封建朝廷在战争失利之后,只能在外来侵略势力威逼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求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

同上述根本原因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示了两个导致中国方面失败的直接原因。

一是中国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动地指出了这种政策的必然后果:“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见本书第8页)他们还切中肯綮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见本书第70—71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为地隔绝

于世”的政策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治变革,而且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昧于时势、安于现状、惯于因循、耽于幻想甚至甘于自欺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负面影响的突出表现,而这正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政治制度腐朽,各级行政机构中腐败现象严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中国是这样一个帝国:“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见本书第88页)许多官员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是心忧天下、克己奉公,而是乘机渔利、收受贿赂,“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见本书第7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见本书第6页);既然统治中国的是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中央政府和这样一支腐败无能的官僚队伍,那么,即便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即便中国军队“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见本书第58页),也根本不可能改变战败的结局。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一系列悲惨事件为其开端的。他们当时很关注中俄关系,因为这也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和屈辱的一个典型例证。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俄国的对华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夺中国领土和财富的野心和阴谋。他们指出,俄国人借英国和法国发动侵华战争之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

贸易的条约”，继而又“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见本书第 86 页），“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见本书第 8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政府狡诈的外交手腕：“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插手干预”，它“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份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见本书第 88 页），结果，“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不管是什么，俄国都有份，而且俄国还得到了黑龙江边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早已悄悄占领的”（见本书第 9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变革，将很难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列强从海上和陆路同时对 中国大举进犯的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见本书第 66 页）；“中国，这块活的化石”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西方列强运来的“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见本书第 122 页），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只能而且必将在人民革命中获得新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充当中国的“拯救者”和“保护人”。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表示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他们指出：在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见本书第 55 页）；“中国人